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之
名师对话系列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

——暨蒙学书目和书影

张志公 著

中华书局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之
名师对话系列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

——暨蒙学书目和书影

张志公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张志公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0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之名师对话)
ISBN 978 - 7 - 101 - 09430 - 5

I. 传… II. 张… III. 语文教学 - 研究 - 中国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5802 号

书 名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

著 者 张志公

丛 书 名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之名师对话

责任编辑 祝安顺 梁 皓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430 - 5

定 价 38.00 元



20 世纪 50 年代，语文界“三老”——叶圣陶（中）、吕叔湘（左）、张志公（右）在叶老家中讨论语文教学问题。



①

②

①/② 1978 年到 1982 年是张志公先生学术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经常赴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和学术演讲。上面两幅照片就是这期间张先生在外做教材调研活动时所拍摄。



①

③

②

- ① 1990 年 5 月，张志公先生在无锡教育学院讲学时所摄。
- ② 1983 年 5 月，张志公先生在厦门做调研时所摄。
- ③ 1983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张志公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参加第 16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时所摄。



張志公先生主要著述封面書影



出版说明



张志公（1918—1997）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汉语语法、修辞学、传统语文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志公先生收集、整理大量传统语文教育教学资料并从中探求经验，撰写了《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以下简称《初探》）一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 1962 年出版。此书为传统语文教育勾勒出了四大步骤，总结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主要经验，对当时的语文教学起了积极作用。书末所附的《蒙学书目稿》，是作者对蒙学和蒙书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革”后，志公先生重新审视传统语文教育，意在探求语文教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改之路，并总结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经验和四大弊端。

1990 年前后，作者再次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初探》一书的基础上，写成《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以下简称《教材论》），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相对于《初探》，此书“是改动幅度相当大的一个新版本”，它以教材为中心，有述有论，并附有大量的蒙学书影，是作者对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又一次总结。

当前，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教育界开始有了向传统语文教育借鉴经验的想法。为此，中华书局决定将张志公先生的《教材论》一书修订再版。

此次修订，我们重新对原书进行了整理和编排：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王本华女士的一篇导论，重新审视了当代语文教育中《教材论》的意义；核对引文及出处，统一体例，改正原版中的文字和标点错误。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当年的技术问题，原书所附的“蒙学书影”多数不清晰，为此，我们尽量找到相关的古籍原件进行重新复制，确实难以找到的，只能一仍其旧，望广大读者谅解。

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是为了完善当下的语文教育。而当下的语文教育就是要走民族化与科学化相结合的道路，并有一套系统的教学设想。这些思想和理念在《教材论》一书中都有反映和总结。因此，可以说此书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一本必读著作，它从实践中来，也必将应用到实践中去。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3年8月2日

导 论

以史为鉴，走民族化与科学化相结合之路

——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导言

王本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自上世纪末由文学界引发的语文教学大讨论起，语文界“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的声音逐渐式微，更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方向本是顺应时代需要提出的命题，但人类普遍存在的两极对立的极端思维模式，使语文的“人文性”被无限夸大，在某一个时期甚至将“工具性”内涵完全抛弃。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这一偏离带来的教学弊端逐渐显露，并被人们所认识和反思，教学界再次回眸传统。中华书局适时出版这一套探讨语文教学的图书〔包括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以下简称《教材论》）〕无疑会给正在逐步走向理性思考的语文教学以有益的影响。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愿意应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对《教材论》的了解和认识写出来，与诸位读者分享。

一、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第一书

我之所以称其为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第一书，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这是第一本相对系统地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专著。

为什么说它研究的是传统语文教育？此书题为《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其实它的前身是1962年10月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

蒙学书目稿》)》(以下简称《初探》)。此外,翻开书的目录我们就不难看出,它是以教材发展为线索,探讨传统语文教育的不同做法,指出这些做法中可以提供的经验和需要避免的问题。因此,应该说,此书研究的是传统语文教育,而不仅仅是教材问题。

为什么说它是“第一书”呢?志公先生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是从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入手的。在先生之前,对蒙学和蒙书进行比较系统研究整理的人或著述少之又少。据先生自己说:“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千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筚路褴褛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①在这种前提下,志公先生广泛搜集,披沙拣金,不仅梳理出了传统语文教育发展的大致脉络,而且收集到相当多的书目、书稿。“如果说张志公先生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那是恰如其分,并无所夸张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志公先生是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第一人。这之前虽然有一些整理或研究,但都是个别的,没有规模,亦不成系统,而《初探》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所以,我称这部书是“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第一书”。由此,我们再看看这部书的发展渊源。

“曾在《人民教育》1961年9月号、11月号、1962年1月号、3月号用张耕为笔名发表过几段摘要,事后得到不少同志的鼓励,所以才把全稿加以修改整理,编成这本小册子。”^③由这个自序可以看出,先生首先是出于研究兴趣和语文教学的需要,写成零散的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来了解到其研究的价值后才整理成书,正式出版的。先生所说的“小册子”,即是196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

这本书出版后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很快在1964年就重印了一次。可惜,“文革”来了,不唯语文,也不唯教育,所有的工作都受到了冲击,一切研究都处在了停滞状态。直到“文革”后,1979年这本书再印过一次。由于时间匆忙,也由于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上海教育出版社,第3—4页。

② 庄文中:《张志公文集4:传统语文教学研究·前言》,广东教育出版社,第5页。

③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上海教育出版社,第8页。

当时百废待兴，先生虽然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没有来得及作进一步的调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语文教学也迎来了改革的春天。为了解决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志公先生再一次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研究与反思，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2年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一书中。《教材论》脱胎于《初探》，但又不是对《初探》的简单修补，而是在原基础上增补删改而成的新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现在这一本并不是1962—1979年本的一般的重版本，只在文字方面小作修订，而是改动幅度相当大的一个新版本。”^①具体的修改在下边还将进一步介绍。

据此，我们可以给这本书画出一条清晰的脉络：零散篇章（1961）——整理出版《初探》（1962）——重印《初探》（1964、1979）——增补删改修订为《教材论》（1992）。较早开始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且自成系统，由此可以看出。

第二层意思，这是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人必读的一本书。

志公先生在《初探·序》中谦虚地说：“限于资料和能力，这里不企图对蒙学作全面的研究，只打算从语文教育这一个角度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就是这样，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还不足以就这个问题研究得很深入，只能作一些比较粗浅的观察和分析。”^②就是这样一个“粗浅的观察和分析”，也是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无法回避或绕道而行的。原因一，这是相对系统地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第一书，理由已如上述；原因二，书中总结了传统语文教育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为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借鉴；原因三，对传统语文教育中的糟粕也多有论述，可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原因四，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对传统语文教育使用的教材进行了梳理，不仅有对主要教材的历史推演和分析论述，还附有相当多的蒙学书目。

“同时，为了便于别的同志参考，节省研究者一部分翻检之劳，也把个人所见所知的蒙书开列一个草目作为附录。”^③开列从先秦到清末的蒙学书目，谈何容易。首先，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可以查到的文献有限；其次，对于各种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导言》，上海教育出版社，第6页。

②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上海教育出版社，第7页。

③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上海教育出版社，第8页。

蒙学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没有留存下来，现在收集起来很困难；再次，过去出版的书少，书家都很重视书目，但是书目中对于蒙书的记录却少之又少。在诸多困难中，志公先生凭着自己广博的学养和对蒙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收集了在当时看来极为广泛的蒙书资料，为后来者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庄文中先生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反映在1962年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书末附的《蒙学书目稿》，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收集这方面资料最为详备的。”

二、从传统语文教育中寻找经验

为什么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对志公先生来说，既是兴趣，更是需要。“我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感到兴趣，差不多是和我从事汉语语文教学工作同时开始的。”“从一接触汉语语文教学工作，我就感到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必要性。”^①

1954年，中央决定要在全中国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组织力量着手准备编写教材。志公先生也在编写队伍当中，并于1955年正式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汉语编辑室主任，主持编写《汉语》教材，正式开始参与汉语语文教学工作。分科教材一方面是要学苏联的做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认识不清，教材编写不太理想。因此，指令一下，各相关部门边研究边制定分科大纲，并进行教材编写，到1956年编写出初中1—6册《汉语》《文学》课本和高中1—4册《文学》课本。但是，教材实验两年就中断了。这段经历以及紧跟着的《语文》教材编写，促使志公先生开始从传统语文教学中寻找经验。“到1958年，这个实验中断了。之后，恢复了语文课，而这时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比分科实验前的更为粗糙，效果也更差。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语文教学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②

从传统语文教育到近现代语文教育，我们一直在摸索一条路，一条适合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路。特别是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废科举兴新学，参照外国的办法实行分科教学，教育开始朝科学化方向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学科像算学、

① 张志公：《张志公文集4·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第235页。

② 张志公：《张志公文集4·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第237页。

博物、物理、化学等，都可以借鉴外国的教材，甚至可以直接照搬。但语文学科（当时称“国文”）不行，甚至搬用都不可能。于是语文学科只好自寻发展。马建忠学习西洋语法，按照西洋语法体系写成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难能可贵；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旧思想多次交锋、论争，白话文开始进入课堂；民国初年语文教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国语”“国文”本分而治之，至新中国成立，“语文”将其合二为一，这都显示着语文教学探索的脚步。

但是，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来说，这些改革距时代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到编写分科教材以及分科实验突然中断，语文教学的发展牵动着许多语文教育者的心。“这时，我愈益感到，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为了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语文教学的路子，我觉得迫切需要对我们长期的传统语文教育进行认真的研究。”^①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志公先生开始了他的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之旅。

先生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这中间显示出他勇于探索、勇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魅力。

先生说：“作者为考察传统语文教育和教材，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进行了两轮考察工作（见所附的论文），这次大修订，也可以算作半轮吧。1969年本叫作《初探》，现在总算已经再探、三探了，因此，把‘初探’二字去掉了。”^②

初探，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收集传统语文教育的资料（包括蒙学书目），并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爬梳整理，力求从传统中寻找一些今天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集中识字、识字和写字分开、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语文教学“过三关”（字关、句关、篇章关）等。这一成果反映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中，有些经验如集中识字、“过三关”，经过实验和推广，对当时的语文教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探，时间是“文革”以后，由于语文教学快速发展的需要，志公先生开始了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第二次探索，自称为“对传统语文教学的再认识”。这一

① 张志公：《张志公文集4：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第237页。

②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导言》，上海教育出版社，第7页。

时期他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和传统语文教育》《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汉语文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等。这些文章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在“初探”的基础上对语文教学做了更深入一步的探讨。他在“初探”重在寻求经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了传统语文教学的三大经验和四大弊端，指出了经验和弊端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影响。以此为借鉴，先生认真思考语文教学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之路，试图探讨语文教学改革之道，提出了语文教学整体设计的初步设想，即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方案。这个设想的初衷是：把初中和高中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以系统的理性知识为先导，并按照一定的知识系统（指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组织全部语文课程。张志公版《语文》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个设想。

三探，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志公先生已逾70高龄，但仍然没有停止探寻的脚步，孟宪范女士赞其为“不以己弊己的科学理性精神”。这一轮的探索主要体现在《教材论》一书中，下面还要进一步阐述。

三、呈现传统语文教材的基本面貌

讲到传统语文教育和教学，就不能绕过教材。关于这一点，志公先生是在几十年的不断探索中逐步认识到的。

为什么不能绕过教材？或者说为什么首先要研究教材？我们从先生的论述中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古代出了很多能言善辩的人，有不少文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传世，可以推断“古人有一套或几套行之有效的语文教育的办法”，就现在看，要找到这些办法只好求之于流传下来的教材；第二，教材能客观地反映传统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通过观察、了解、思考、分析，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三，教材能敏感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读物；第四，教材能充分体现本国母语的特点，使得各种教育易于被学童接受，又能起到规范语言、纯化语言、促进语言发展的作用。所以，即便是在撰写《初探》时，对教材的梳理与评价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到了

修订时，更直接更名为《教材论》，对教材本身的梳理、分析、论述也就成了全书的重点。

（一）教材论

这一部分是本书的主体，主要是对传统语文教育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教材进行分阶段介绍和评价，呈现了传统语文教材发展的基本面貌。志公先生将传统语文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由此构建出这本书的编写体系。

第一个阶段，初期识字教育和写字训练，属于启蒙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教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篇》等，书中对它们的源流、发展、基本内容、使用情况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还论述了从初期的识字课本中得到的三项重要经验：集中识字，认字与讲、用、写字分开，使用整齐的韵语进行初期的识字教学，当然也谈到了一些问题，诸如：对很多字的字义不了解，只是“硬认，死记，茫茫然地背诵”；“以成年学者的主观愿望欺侮小孩子”，即以成人观念教育孩子，讲的是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大道理。

第二个阶段，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相结合，是以启蒙教育为基础的进一步的识字教育阶段。这一阶段涉及的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弟子规》《女儿经》《昔时贤文》等，轶闻掌故类的《兔园册》《蒙求》《龙文鞭影》等，以及与历史知识、各科知识相关的一些课本。这个时期有了书法训练，从第一个阶段写字训练的描红、脱格，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临摹，主要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四大书法家。韵语和对偶仍然是教材和教学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也正好帮助孩童从单纯的识字向有意义的阅读慢慢地过渡。

第三个阶段，初步的读写训练。这个阶段，学生开始读经（主要是“四书五经”），与此配合，学生开始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浅易的诗歌，主要教材如《书言故事》《日记故事》《咏史诗》《千家诗》《神童诗》等。这个时期，志公先生对两种做法大为赞扬：一是教学生读诗，一是让学生练习属对（也叫“对对子”）。儿童识字后，正是渴望阅读的时期，但毕竟所认识的字有限，所懂的知识 and 道理也都不多，这时引导他们阅读音韵和谐、朗朗上口的诗歌，无疑会极大地提升阅读兴趣。而且，诗歌语言精练，意蕴丰富，一些诗还有很强的画面感、抒情性，也有益于孩子汉语语感的养成。至于属对，在过去几乎是启蒙之后的必修课程，受到人们的

青睐。“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语汇的训练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①

第四个阶段，进一步的读写训练。在这个阶段，阅读和写作训练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但又有各自的内容和作法。就阅读训练看，这个阶段的教材主要是古人选注和评点的本子，如《文章轨范》《古文关键》《古文标注》等，最为流行的是《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同时，在阅读教学中，确立了“文”“道”不可偏废的原则以及熟读、精思、博览的阅读方法。就写作训练看，志公先生就某些可资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几个问题，并加以探讨。主要包括：第一，一般写作训练的原则——“词”“意”并重；第二，作文训练的步骤——先“放”后“收”；第三，作文训练的方法——多作多改；第四，从模式到程式化——八股文。其实，这些问题仍然是今天的写作教学需要研究和探讨的。

（二）蒙学书目和书影

这是本书的史料部分，也是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最具参考价值的一手资料。

《初探》中，蒙学书目只是个附录性质的东西，先生谦虚地称它为“蒙学书目稿”，但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已是这个领域的书目中最详备的一种”^②。到《教材论》，它不再是一个从属的内容，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先生修订时一个大的调整，就是对“《蒙学书目》作了调整和补充，成为独立的一部分，不再作为附录”。^③这样就更加凸显了这些材料的史料价值。

此外，书影也是《教材论》中特别突出的内容。先生认为：“既然侧重教材，则教材的书影宜于相应增多（《初探》出版后，书影格外受到欢迎）……并且把书影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书名副标题中和‘蒙学书目’并列标识出来，既符合书的内容的实际，也表明了我们展示出这部分遗产的意图。”^④

蒙学书目和书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第98页。

② 庄文中：《蒙学书目稿·编者按》。

③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导言》，上海教育出版社，第8页。

④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导言》，上海教育出版社，第6页。